

雷根政府重振「實力外交」的構想與目標

區鉅龍

背景與特質

一九八〇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由於在任的民主黨卡特總統無法緩和美國長期經濟萎縮，使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直線上升；再加上伊朗扣押美國人質久未獲釋，美軍營救行動又鎩羽而歸；古巴悍然派軍干涉安哥拉內戰；河內一面倒向蘇俄並在莫斯科的慫恿下公然大舉進軍高棉和寮國；古巴在蘇聯大批新軍援下亟謀在中南美洲擴大其「反美」勢力；蘇俄不容阿富汗親俄政權受挫而進軍阿國；美蘇第二階段限武條約因對美不利而遭受國會抵制。凡此一連串的內政與外交失策，遂使卡特所代表的民主黨在總統競選期間始終處於不利形勢。雖然卡特及民主黨爲了爭取選民而提出一套復甦經濟和重振國力的政治號召，但已難能挽回美國民衆普遍對卡特政府失去之信心。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朗納·雷根針對卡特政府在內政與外交上的雙重失策，尤其是針對卡特坐視蘇聯在世界各地隨心所欲擴張實力與影響力，嚴重損害美國國家安全與利益，乃不遺餘力地猛烈抨擊卡特四年執政一無所成，同時譴責卡特的內政與外交失策已使美國陷入立國以來最危險的境地。基本上而言，共和黨與民主黨所提競選政綱政策並無多大異處，尤其關於重整國防和對抗蘇俄挑戰之決心，兩黨政綱大致相同。不過，由於卡特四年敗績在先，而雷根的競選口號又能迎合民衆求變的心理，故相形之下，雷根提出的內政、國防與外交「革新」的主張反而更能產生振奮人心之作用。雷根終獲選民擁戴，入主白宮，爲共和黨重振旗鼓，也爲美國的未來提供了較樂觀之遠景。

從美國外交史之發展而言，美國「實力外交」的演變，充分反映了美國處身於不同時代背景下，所面臨的不同戰略利益和不同的敵人威脅與挑戰。美國建國元勳喬治·華盛頓在其遺囑中，曾忠告美國人民不可步隨歐洲列強「強權政治」之惡習，更不可與任何國家建立同盟關係。華盛頓之忠告一度爲美國早期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石。但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美國國力隨着西部開發成功而迅速增強。美國爲開拓海外市场已不能保持早期逃避「強權政治」的傳統思想。美國軍力也隨着國內經濟力量的成長而壯

大。美墨戰爭與美西戰爭更充分證明了美國已邁向強國之途。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美國第五任總統吉姆·門羅為維護美國在西半球之國家利益，確定美國在拉丁美洲之「勢力範圍」，不許歐洲列強在該地區為所欲為，乃宣佈了歷史上聞名的「門羅主義」。「門羅主義」具體表現了美國早期「實力外交」的概念與目標。但嚴格而言，這仍是地區性而非全球性的實力外交戰略。美西戰爭後，美國從西班牙人手中取得夏威夷和菲律賓，美國之勢力始伸延至遠東。唯此期間，美國仍無以武力為後盾執行其「實力外交」的決心。例如美國對華所採取的「門戶開放」政策，無論從形式上或實質上而言，均非以「實力外交」為基礎，更未以武力為其後盾。

從美國近代外交史之演變而論，「實力外交」由地區性發展為全球性之外交與國防戰略，始於二次大戰結束國際政治轉入東西「冷戰」兩極化局面之後。同時「實力外交」的概念和目標，除了為達成美國國防與外交利益之外，更含有地緣政治、經濟、貿易、文化與意識形態等多層意義。此一時期的「實力外交」雖已成為美國對抗國際共黨勢力的基本外交原則，但其後因受國內和國際上不可抗拒之複雜變數，以致「實力外交」因時因人因地而出現不同的形式和本質。此外，武器的發展及美蘇之間軍力對比的變化，也直接影響美國執行「實力外交」的實際作為。例如杜魯門時代着重推動馬歇爾計劃，建立北大西洋聯防安全體系及圍堵政策等，以全面防止赤禍蔓延；艾森豪時代則又強調「全面反擊」(Massive retaliation)、「邊緣政策」(Brinkmanship)、「解放鐵幕政策」(Roll-back policy)及成立多邊與雙邊防務體系；甘迺迪時代除再度強調「實力外交」的基本原則外，同時又提倡「對抗政策」(Confrontational policy)以應付柏林危機、古巴事件及越戰擴大等一連串的國際共黨軍事挑戰。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美蘇雙方軍力對比已發生變化，蘇聯在戰略核武器方面已逐漸迎頭趕上，美國已難能壟斷戰後「唯我獨尊」的軍事優勢。同時越戰的挫敗更導致美國國內嚴重政治分裂，直接削弱和約束美國「實力外交」之執行。故從尼克森、福特以至卡特時代，美國提出了「以談判代替對抗」、「東西方和解」、「圍堵而不孤立」等較具彈性的外交策略。其中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五日宣佈的「關島宣言」，更奠定了美國在亞洲採取「低姿態」的外交國防戰略；而卡特時代由於其基本外交概念係建立於錯誤的假設之上，遂導致美國國際聲望一落千丈，同時也產生了「親者痛仇者快」的外交逆勢。

卡特時代外交上的偏差，主要基於下列錯誤概念：(一)卡特深信經過越戰的慘痛挫敗和水門醜案的政治震撼，美國民眾與輿論界似乎已無心支持強硬外交政策；(二)卡特認為美國武器銷售政策並非「良策」，美國必須強調「人權」的維護而非武器的輸出；(三)卡特認為在日漸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下，美國似乎已不易採取表裏一致而堅定不移的外交政策，而必須玩弄「謀術」以維護美國外交戰略利益(包括所謂「聯匪制俄」的謀略在內)；(四)卡特以為美國對蘇聯的「謙讓」，尤其是在美蘇第二階段核談判上的讓步，當有助於使蘇聯在國際行為上更合作、更理性、更自我約束。

事實證明，由於卡特政府上述錯誤之假設，加以卡特在許多重要外交問題上缺乏深謀果斷，以致美國國際影響力日漸下降，

。美國國際信用一落千丈。誠如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喬治·包爾 (George W. Ball) 感嘆指出：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最明顯的趨向，乃是美國在它的盟邦與友邦，甚至於在其他非共國家的心目中，已經失去了它往日的聲望和權威^①。卡特在國防戰略與外交政策開倒車之事例不勝枚舉，其中最受人非議者包括他取消生產 B-1 轟炸機、擱置生產 MX 飛彈、Trident 核子潛艇及中子彈等新型戰略武器系統，片面斷絕與中華民國之外交與軍事關係，計劃從南韓撤出美軍地面部隊，停止銷售武器給若干非共國家等一系列的失策。而卡特過份強調「人權外交」的結果，反而造成了美國與若干世界非共國家關係的惡化。

迨卡特的少數高級顧問恍然領悟到世界權力均衡之發展對美國已造成不利時，卡特政府却又束手無策。同時由於北大西洋公約國家日漸暴露彼等之軍事、內政、外交與經濟弱點，卡特為一時權宜之計，乃在遠東拉攏中共為「戰略夥伴」企圖藉此保持東北亞之戰略均衡^②。卡特下臺之後，曾擔任白宮國家安全特別助理的布里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竟將卡特政府無法執行強硬外交之失策完全歸咎於卡特政府中屬於麥加文 (George McGovern) 民主黨「鴿派」人士的短視與阻撓。按照布氏的說詞，民主黨「鴿派」人士不但反對他極力主張恢復美國實力外交的觀點，同時也澈底反對任何權力政治的概念，並攻擊他主張美國應該採取更強硬的外交政策^③。布氏的自我辯護或許所言屬實，但身為美國外交政策最高決策者的卡特總統對此自不能迴避責任。其競選連任慘敗，更證明了美國民眾不容美國國力長期萎縮的意願。

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五日共和黨在底特律 (Detroit) 召開全國代表大會，除正式提名雷根為總統候選人之外，同時通過了黨的基本內政與外交政策。在有關美蘇關係方面，共和黨政綱指出：

「美國和其盟國及全世界各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乃是如何阻止蘇聯的全球性野心。美國必須全力以赴，應付此一挑戰，因為目前的危機確是美國立國二百年來最嚴重者。蘇聯目前正不遺餘力追求軍事優勢，同時對民主工業國家及脆弱的開發中國家展開軍事壓力和思想進攻。

本黨認為美國必須基於堅定的原則和堅強的實力方能和蘇聯進行談判……我們不會像卡特政府那樣，以幼稚的期望，片面的讓步，徒勞的巧語和微不足道的策略，作為美國對蘇聯政策的基石」^④。

此外，共和黨政綱還譴責卡特政府讓蘇聯輕易獲得美國現代科技，如虎添翼，後果堪慮。共和黨政綱所表現的強烈「反俄」態度，一方面固然是針對卡特的軟弱外交而發，另一方面則反映了美國輿情求變和保守勢力重新抬頭。換言之，雷根深信其重建國

註① George W. Ball, "Reflections on a Heavy Year", *Foreign Affairs*, Vol. 59 No. 3, 1981, pp. 475-476.

註② William R. Kinmer, "A Strategic Triangle of Two and a Half Power", *Orbis*, Fall 1979, pp. 527-531.

註③ [紐約時報]，一九八一年四月廿一日。

註④ 共和黨政綱有關美蘇關係部份見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Vol. 38, No. 29, July 19, 1980, p. 2052.

防和「實力外交」的構想確實反映了當今美國民情趨向和思想主流。而所謂「雷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更具體涵蓋了內政、經濟、國防與外交上的大整頓和長程目標^⑥。

以「反蘇」為核心的「實力外交」

自從蘇軍入侵阿富汗之後，卡特政府雖有對莫斯科採取強硬姿態之傾向，而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所謂「平行戰略利益」的昇高，在阿富汗事件之後亦已更趨明顯；不過，卡特政府基本上仍認為蘇俄的軍力雖然已逐年成長，但尚不足以對美國本土構成威脅或足以控制世界。按照布里辛斯基的看法，蘇聯的軍事力量仍不足以制服美國，但它已足使地區性的衝突更難解決^⑦。所以從一九八〇年開始，卡特政府已放棄了美國一九七〇年代對莫斯科和北平所一貫採取的「均衡」政策而開始玩「中共牌」。

雷根以「反蘇」為核心的「實力外交」，其基本動機雖與卡特無異，但在基本概念上和實際作法上顯然不同。雷根政府對蘇俄的基本看法似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一)從制度上而言，蘇俄本質上具有雙重面貌：其一是，蘇聯正面臨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腐朽、經濟凋零、國內不滿情緒及東歐各附庸國離心等危機；其二是，雖然蘇聯正面臨上述困境，但它的軍事力量不僅與日壯大，而且毫無顧忌的正在全球各地展示它新的武力^⑧。

(二)雷根深信蘇俄為轉移內部問題，勢必向外從事更多冒險行為。故一九八〇年代將是蘇聯窮兵黷武最危險的時代^⑨。

(三)雷根認為蘇聯為了實現它推動世界革命和世界霸權的長程目標，將不惜一切的從事違法、撒謊和欺騙行為^⑩。

(四)蘇聯的軍力已經從傳統上屬於防守性的地面部隊發展為足以支持推動「帝國主義」外交的攻擊性陸、海、空三軍部隊。同時由於蘇俄新一代的接棒人只懂得如何向外擴張勢力，故一旦他們掌權後，蘇聯的冒險作風勢必更加膽大無忌^⑪。

註⑥ 有關雷根內政、經濟與國防外交之革新，請參閱陳裕清著「雷根革命的演進」，〔中央日報〕，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八日；George Will, "The Most Serious Strategic Program in a Generation," *China Post*, November 30, 1981; Robert Pear, "And now for the 'New Federalis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 1982.

註⑦ James Resto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Brezinski",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December 31, 1980.

註⑧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 1981.

註⑨ 同註⑧。

註⑩ *Newsweek*, February 9, 1981.

註⑪ *Time*, March 16, 1981。國務卿海格談美蘇關係。

(四)蘇聯目前在全球各地進行干涉行爲，實際上等於已將「布里茲涅夫主義」伸展至蘇聯傳統霸權勢力範圍以外之地區^①。雷根任命海格爲國務卿，主要是基於他倆對蘇聯的基本看法不謀而合。海格的強烈「反蘇」態度在其擔任北約組織統帥時期即已表露無遺。海氏在國會舉行的提名聽證會上曾強調，如果讓世人繼續誤信以爲蘇聯在全球各地已佔優勢，美國的外交必將處於極爲不利的形勢^②。在他舉行的首次記者會上，海氏一反卡特時代的論調，對人權問題採取避重就輕的立場，而強調蘇聯的許多「罪行」，包括蘇俄支持國際恐怖主義及其在西半球和非洲等地史前無例的冒險作風^③。爲了有效阻止蘇俄擴張其勢力和影響力，海格認爲美國的外交政策必須建立於下述三個基本要素之上：(一)一貫性的政策(有效的政策不是朝秦暮楚臨時應變的政策)；(二)可靠的政策(美國不宜輕易向友邦做出軍事與外交承諾，但一旦立下諾言，則必須嚴守信用)；(三)均衡的政策(美國在應付各種爭端性問題時必須保持調和與自身的利益)^④。按照海格的解釋，均衡的政策須要美國與蘇聯進行限武談判，但同時也要增強美國本身的軍力。實際上，雷根與海格均認爲，迅速擴張美國軍力乃是美國有效執行實力外交最基本的條件。

從美國的觀點而論，將當今世界危機一概歸咎於克里姆林宮驕武主義的新冒險作風，並以「反俄」爲美國當前外交口號，乃屬理直氣壯合乎邏輯的作爲。不過，由於美國經濟復甦計劃及重整國防方案難能有立竿見影之績效，雷根政府也體認到美國不能獨當全面反擊蘇俄之重任，而必須聯合世界上一切「反俄」勢力與政權，並以西歐、日本、中共等爲「反俄」軸心。雷根入主白宮，西歐各國基本上均支持雷根力圖恢復美國在自由世界的傳統領導地位。例如法國戴高樂派，甚至於法國社會黨，均同聲批評季斯卡政府的「媚俄」政策；德國在野黨基督教民主黨要求施密特總理對莫斯科採取較強硬之態度；英國民衆與輿論也同聲支持余契爾首相反對蘇聯向外擴張的冒險政策^⑤。一九八一年七月廿一日，美國、西歐、加拿大及日本等七個自由世界工業先進國家在渥太華高峯會議結束前發表了聯合宣言，一致聲明只有在實力之基礎上方能與蘇俄進行談判和合作，同時譴責蘇軍入侵阿富汗製造世界危機，並支持聯合國主張讓高棉人民自力自主的決議。而中共報刊在雷根執政初期也頗多「贊許」雷根強烈「反俄」的姿態。一九八一年六月中旬海格訪問北平時，中共雖然不滿海格表示雷根政府將履行「臺灣關係法」的承諾，但仍樂見雙方均一致認爲今天世界上的問題，乃由蘇俄「霸權主義」所引起。海格與中共「外長」黃華均形容那次會談對雙方的共同戰略利益已產

註① 同註⑤。

註② *Nomination of Alexander M. Haig, Jr, Part I, 9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February 9-14, 1981*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1), p. 200.

註③ *Newsweek*, February 9, 1981.

註④ 同註⑤。

註⑤ *Newsweek*, January 5, 1981.

生了「非常大的一致共識」^⑥。此外，東南亞各國也多支持雷根決心在亞洲重整威望的政策^⑦。而雷根決心在薩爾瓦多問題上與蘇俄劃清「井水不犯河水」的界線，以及恢復銷售武器給阿根廷、委內瑞拉等國的新措施，均頗獲拉丁美洲非共國家的一致喝采。在非洲方面，雷根政府對抗蘇俄之決心，可由美國決定援助遭受利比亞卡達費政權威脅之國家，見其端倪。在中東方面，雷根政府已撥出十餘億美元的軍費以強化美國快速部署部隊在未來應付蘇俄可能在該地區發動軍事挑戰的力量。

從基本上言，雷根政府強調蘇俄的威脅，並無苛刻之處。不過，雷根及其高級幕僚一味將世界問題一概歸咎於蘇俄，並以「連鎖原則」(Linkage principle)作為衡量美蘇關係之準則，似乎已產生若干反效果。雷根政府中一些「鷹派」人士更無意與蘇聯達成新限武協議，主張美國不惜一切片面擴充軍力及採取一切措施正面對抗蘇聯^⑧。西歐諸國及日本等雖然原則上支持雷根對蘇聯採取堅定之姿態，但對雷根政府近乎教條式的「反俄」作風則有所保留。很明顯的，雷根強烈的「反俄」作風，與西歐國家希望透過經濟與貿易關係，衝破西歐與東歐國家間的政治和意識型態的障礙，背道而馳。法國及西德為了應付未來能源需要，曾於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旬決定提供一百四十億美元之貸款，協助蘇俄完成由西伯利亞連接西歐之瓦斯管道^⑨。雷根政府深慮此舉將使西歐國家未來更依賴蘇俄之能源供應，進而削弱西歐對蘇俄及東歐國家政治上討價還價之資本，甚或影響西歐整個經濟與同盟體系，曾致力阻撓而無效果。此外，由於西歐各國及日本均多依賴中東石油維繫工業生計，也難毫無保留的完全支持雷根政府之中東政策。同時一些中東國家，包括約旦及沙烏地阿拉伯，均認為中東之危機主要來自以色列的好戰行爲及其對巴勒斯坦人民自治問題的頑固立場，而非來自蘇俄之侵略。約旦國王胡笙並曾面告海格：約旦不能贊同美國將蘇俄視爲中東問題主要來源之觀點^⑩。

西歐國家除了基於經濟與貿易因素而不能忠心耿耿追隨雷根全面「反俄」之政策外，近年來各國內部「反核武」及「反戰」暗流之滋長也已形成一股政治力量，間接阻撓了各國響應雷根號召西方國家團結對抗蘇俄之強硬政策。無可諱言的，一九七〇年代東西方「和解」的形象（或假象）已經普遍在西歐孕育了苟安和消極的政治心態。此一心理現象反映於西歐民衆對蘇聯威脅的缺乏真確認知，最爲明顯。西歐各階層許多人士甚至認爲：由於蘇俄必須同時應付來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中共的威脅，故其積極擴充軍力乃是理所當然的反應^⑪。而這種對蘇俄不切實際的認知又直接助長了西歐國內傾向姑息和中立的「反核武」與「反戰

註⑥ *China Post*, June 15, 1981.

註⑦ 參見 Reijiro Toba, "ASEAN Favors Reagan Hard-Line Foreign Policy", *Asia Pacific Community*, Winter 1981, pp. 55-68.

註⑧ Strobe Talbott, "The Risks of Billboard Diplomacy", *Time*, April 27, 1981, p. 17.

註⑨ *Newsweek*, January 5, 1981, p. 32.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Lord Chalfont, "Mr. Haig and the 'idiot stick'",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27, 1981.

「逆流。當然，這一股逆流之出現，美國本身實不能完全逃避責任。因為西歐普遍消極的心理狀態，主要可追溯於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外交政策缺乏明確方向而導致西歐各國對美國領導地位缺乏信心^②。蘇俄利用西歐當前普遍姑息和中立的思想逆流及「反核武」運動，進一步製造美國與西歐之不和，則是衆所週知的事實，此處不必贅述。值得一提的是，蘇聯強烈譴斥雷根的全面「反俄」作風，已使東西方「和解」的基礎發生危機，同時蘇聯也一再聲明莫斯科將不坐視美國片面擴充軍力以恢復美國軍事與戰略優勢之長程目標。故從蘇聯的觀點而論，一九八〇年代將是美蘇雙邊關係及全球性戰略鬭爭的關鍵性年代。同時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或許也已洞察到「雷根主義」與「雷根革命」不僅代表雷根個人的政治哲學和意識型態，同時它也反映美國當今思想主流。

物質與心理建設並重的強國方略

一般觀察家僅注意到雷根強調經濟復甦和國防建設的長程目標，而忽視了雷根同時也注重心理建設作為復興美國的整體方案。自從雷根總統上臺後，在他許多次講演或談話中，不難窺見他重視精神與心理建設的觀點。例如去（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七日在西點軍校的一次重要講演中，雷根指出他的政府在處理國防事務及人民的經濟需要時，已經恢復了美國傳統的兩黨團結的精神。同時雷根強調美國在追求和平的時候如能維持實力，成功的機會將更大。不過，他也指出，單靠武力並不能保障美國的安全，要贏得勝利還要靠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團結精神力量。雷根認為一九七〇年代越戰的「後遺症」已經嚴重腐蝕了美國人民的信心和戰鬭意志。他嚴厲譴責一般人認為美國是一個病態的社會的偏激看法^③。雷根對於美國人民在越戰後普遍存有不重視軍人的情緒，尤為心痛。為了糾正這種不正常之消極心理，雷根會理直氣壯的指出越戰將為美國歷史留下光榮的一頁。

雷根的整体社會心理建設，也同時反映於他主張整頓美國政府體制的大方案。按照雷根的看法，自從羅斯福總統施行「新政」(New Deal)，乃至詹森總統推動「大社會」(Great Society)等內政措施以來，美國無形中已步入福利國家制度之途，並使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日益膨脹。凡此皆違反美國立國基本精神，其禍害已極為明顯。雷根因此將美國社會的弊病，包括大幅度的失業率、都市生活的不安與動亂、經濟的萎縮不振以及軍事力量的衰弱，一概歸咎於聯邦政府權力擴展的結果^④。雷根認為今日的美國已非卅年前的美國可比，而他所提出的「新聯邦主義」(New Federalism)，乃是針對美國當前國力不振之根源而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聯合報」，一九八一年五月廿八日。

註④ Dieter Stolze, "A Genuine Revolution: A New Conservatism Takes Hold", *World Press Review*, January 1982, p. 43.

雷根政府重振「實力外交」的構想與目標

下良藥。此外，雷根也激勵美國人民恢復他們傳統的愛國情操，珍惜美國傳統價值與美德，及發揚美國立國精神與宏偉理想等政治號召。甚至連一貫主張「實力外交」的國務卿海格也未曾忽視重振美國人民精神與道德勇氣的必要。海格曾警告說，如果民主國家的人民缺乏勇氣抵抗獨裁者的侵略行爲，則獨裁者將可爲所欲爲，所向無阻。民主國家人民有勇氣維護他們的生活價值才能保障他們的生存。人類爲追求美好生活與自由應不惜一戰^⑤。

很顯然的，雷根政府深信美國欲重振國力，必須同時着重國防建設與精神心理建設雙重目標。而美國經過越戰的挫折和一九七〇年「和解」政策所造成的普遍消極心理，更急待雷根政府重振美國人民「精神武裝」與道德勇氣的果斷作爲。所謂「雷根革命」的廣泛含義實際上也包涵了上述心理建設之長程目標。當然，雷根的整個建國方略也曾遭受民主黨人士及美國學界與輿論界的非議。不過，大體而言，批評者却拿不出比「雷根主義」更行得通的復興方案。而更重要者，雷根重振國力的方略基本上反映了美國當前民情傾向的主流。雷根也一再強調，他的經濟復甦方案並非短時間內即可實現。至於外交方面，前白宮安全助理艾倫也曾指出，現在已不是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那時美國的希望可成爲美國盟國的政策。雷根總統所提的每一項政策，不一定能在一九八四年得到結果，但雷根總統決心要改變過去的政策^⑥。而美國目前克服國內外難題更須要有堅定的領導者和明智的長程政策。這一點，雷根表現遠較卡特的缺乏深謀和果斷爲突出。

雷根的物質建設方案主要包括重振美國的生產力和恢復美國軍力的優勢。爲達成這兩大目標，雷根政府採取了大刀濶斧及前所罕見的經濟和國防措施。在經濟復甦的目標上，雷根政府一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以「需求面經濟」(Demand-side economics)爲骨幹的經濟體系，而以「供給面經濟」(Supply-side economics)爲重振經濟的主要措施。至於「供給面經濟」是否確能解決當前美國的經濟困境，學術界和輿論界議論紛紛。雷根政府曾一再強調，其整個經濟復甦方案不能保證將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但肯定其長程功效不容置疑。雷根政府執政一年期間，美國經濟仍未有轉好的趨向。至一九八二年初，失業人數高達九百五十餘萬人(佔勞動力的百分之八點九)，工業生產量減少百分之六點九。此一失業率僅比二次大戰結束初期爲低，預期可能上昇。不過，通貨膨脹已從一九八〇年的百分之十二點四降爲百分之八點九^⑦。一九八一年度聯邦政府預算赤字高達美金五百八十億元。雷根政府將去年經濟未能轉好主要歸咎於卡特時代所遺留的經濟失策與病症。雷根政府本(一九八二)年二月向國會

註⑤ 海格講演，“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Its Future: The Willingness to Defend Our Values”, *Vital Speeches*, November 15, 1981, pp. 67-68.

註⑥ [大華晚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六日譯自美國《商務週刊》訪問艾倫談話。

註⑦ Jim Adams, “Graue Worry as Recession Bites into American Lif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8, 1982.

提出的一九八三年聯邦政府預算高達美金七千五百七十六億元，並預期同期赤字將高達美金九百一十五億元^②。按照雷根政府的預測，其經濟復甦方案將自本年中開始見效。屆時能否實現，不僅關係到雷根和共和黨的政治前途，甚而將影響雷根執行「實力外交」的構想與目標。

「實力外交」的具體表現

雷根政府執政一年以來，雖然以復甦美國經濟為當前急務，但同時也以行動表現了執行「實力外交」之決心，其具體作為包括下列八項：

(一) 解除卡特政府過去設定的武器銷售限制，以加強美國及其盟國和友邦的備戰狀態和能力。過去卡特政府禁止美國駐外代表協助美國武器銷售商的禁令已被解除。雷根政府認為銷售武器乃屬美國本身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時銷售武器將可使美國三軍在海外更易於獲得軍事設施，增強美國國家安全。按照國務院主管安全援外的國務次卿布克萊的解釋，雷根政府對於武器銷售的新政策，大致包括以下三點：(1) 美國對於重要盟邦及具有合作關係的國家所提購買武器要求，將給予最高優先考慮。這些交易將有助於「重振盟邦」及促進美國國防生產能力。(2) 雷根政府必須確定，上述友邦所要求的武器符合該國需要，能夠為該國所吸收，而且不致於在軍事支援體系或財政資源方面造成過重負擔。(3) 雷根政府要求國會對那些無力購買美製武器的國家給予低利貸款^③。更重要者，雷根政府一反卡特的政策，在武器銷售政策上不受「人權」因素的限制。

(二) 恢復美國兵役登記制度，並預期在未來四年內使美國三軍人員增加百分之十。美國為達成其戰略目標，必須將目前為數二百三十萬的三軍，在一九八五年增為二百卅萬人員^④。

(三) 建立快速部署部隊及擴建海外軍事基地。去年中期，雷根政府曾要求國會在一九八一年度國防預算中另增美金三百三十八億元，其中包括十億元作為增強快速部署部隊之設備與作戰能力。同時雷根政府將要求國會在一九八二年另撥款美金四十五億元，作為美國擴充在埃及、阿曼、索馬利亞、肯亞及印度洋狄亞哥加西亞島上的軍事基地^⑤。

(四) 擴大友邦軍事人員在美國受訓。雷根政府去年曾要求國會撥款美金四千七百萬美元作為協助友邦軍事人員在美受訓之用。雷

註② *China Post*, February 9, 1982.

註③ [聯合報]，一九八一年五月廿三日。

註④ *China Post*, July 10, 1981.

註⑤ Philip C. Clarke, "Rapid Deployment Force: How Real A Deterrent?", *The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 June 1981, p. 39.

根政府認為，此種訓練將有助於增強美國友邦的國防安全及其親美的態度，同時因為受訓軍官目睹和體認美國民主制度，勢將有助於促進這些國家的人權發展^⑳。

(v) 雷根政府修改了美國自一九六九年以來一直固守的「一個半戰爭」的戰略。這一戰略的原始構想是美國準備在歐洲跟蘇俄進行一場大戰，並同時應付第三世界的一場小衝突。雷根政府認為由於蘇俄軍力已較前強大，美國必須準備從事多戰線的戰爭，其中包括在歐洲和波斯灣應付蘇俄之重大戰爭。

(vi) 在亞太地區重建美國的外交與軍事影響力，包括加強美國與韓國，菲律賓及日本的雙邊軍事關係，以及增加對東協國家的軍援。雷根政府將於本年度提供為數美金六億三千八百六十萬元的軍援給東協五國，作為美國加強在亞洲軍力之一部份措施^㉑。

(vii) 雷根政府強調「連鎖原則」作為美蘇關係的準則。所謂「連鎖原則」即蘇聯在世界任何地區之行為均將影響美蘇雙邊關係及美蘇全球戰略，美國不能視蘇俄在任何地區之行動為孤立事件。雷根政府對波蘭問題之反應充分反映了「連鎖原則」的基本精神。

(viii) 以「實力」作為美蘇談判之後盾。雷根政府一方面與蘇俄進行歐洲中程核彈限武談判，另一方面則要求國會在一九八三年度預算中撥款美金二千一百六十億元作為國防建設之用。按照美國國防部次長卡魯吉的看法，蘇俄持續擴大軍力的危險遠比美國預算赤字之危險來得更大^㉒。很明顯的，雷根政府將不惜肩負財政重擔，迅速重振國防力量，以作為美國執行「實力外交」之後盾。

現任美國副國務卿史托塞爾曾闡明雷根政府全盤外交政策動向，係基於下述四個基本因素：(一)美國在政策與行動上必須堅強、平衡、一致、可靠；與盟國及友邦必須充分磋商；(二)美國必須強化它的軍事地位，以抵消過去廿多年來蘇俄大舉加強的軍事力量；國防雖非萬能，但無國防則一切免談；(三)美國將設法使蘇俄的國際行為較為收斂、溫和，並較為遵守國際法，但美國必須與盟國友邦結合力力量方能與蘇俄和平共處；(四)美國必須恢復其經濟活力、生產力與平衡。解決國內問題符合美國致力建立一個更加繁榮、穩定、平等的世界秩序的長期努力。不然，上述各項優先項目將無一能執行^㉓。

雷根政府重建「實力外交」的構想與目標已十分清楚，其成敗勢將影響八〇年代國際政治的動向。站在自由世界的立場而言，吾人希望雷根重振美國國力之構想與目標將能如期實現。因為一個強大而堅定的美國不需要玩「中共牌」或「蘇聯牌」，而可以整個自由世界的安全與利益為優先考慮。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副研究員)

註⑳ 國務院主管安全援外國務次卿布克萊在國會證詞，見*China News*, March 20, 1981.

註㉑ *China Post*, June 21, 1981.

註㉒ *China Post*, February 10, 1982.

註㉓ 史托塞爾於一九八一月四月廿四日在美國洛杉磯「世界事務協會」講演，中文節譯見「中國時報」同年四月廿六日。